

论维尔比夫人的翻译哲学思想*

孙 凤 屠友祥

摘 要：维尔比夫人理论中的“翻译”是一种在大脑中自主进行的“转化”，是自动进行且无法取消的认知活动，是思想翻译。在表意学理论体系中，“翻译”作为方法论而存在，意义混乱问题出现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这种自主翻译功能的停滞或退化，对“翻译”功能的恢复是解决意义混乱问题的本要。可译性的基础在于人类共通的经验，而“母性感知”作为人类潜在具有的共同而本能的感知力，是获取此种经验的前提，也是对自主翻译功能最早、最基本的运用。强调对事物本身进行感知，这扭转了翻译中“存在之被遗忘”的窘境，打破了僵化的翻译模式，凸显了意义的动态性。表意学追求“向上的翻译”，以对话性的翻译为形式，以获取“意味”为目标，具有明确的伦理意味，这对实现有效沟通、化解无谓矛盾等意义重大。通过对维尔比夫人的翻译哲学思想的阐释，可以看出表意学注重意义之动态性，强调对体验/经验之感知，关切意义之“实效”的翻译思想无疑是具有革新性的。

关键词：维尔比夫人，表意学，翻译哲学，结构相似，向上的翻译

On Lady Welby's Translation Philosophy

Sun Feng Tu Youxiang

Abstract: In Lady Welby's theory, "translation" is an autonomous "transformation" in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建符号学基本原理视域下的符号否定性与本体论研究”（17BZW003）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普通符号学与生态符号学研究”（16JJD740014）阶段性成果。

the brain, an automatic cognitive activity that cannot be cancelled, or in other words a thought translation. In Welby's theory of signifiacs, translation exists as a methodology; one of the roots of meaning confusion lies in the stagnation or degeneration of the autonomous translation function, which must be restor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eaning confusion. The foundation of translatability lies in similarities in human experience; "mother-sense", the common, instinctive and potential perception of human beings, is the premise of acquiring such experience and the earliest and most basic application of autonomous translation. It emphasises the "perception" of the thing itself, which reverses the dilemma of "forgetting of being" in translation, breaks the rigid translation model and highlights the dynamics of meaning. The theory of signifiacs pursues "upward translation" in a dialogical form, taking "significance" as its goal, and it is clearly ethical, which is important for achieving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avoiding unnecessary conflict. Analysis of Lady Welby's translation philosophy reveals that the theory of signifiacs also relates to the dynamics of meaning, emphasising the perception of experience. Her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 emphasises the "actual effect" of meaning, which is undoubtedly innovative.

Keywords: Lady Welby, signifiacs, translation philosophy, structural similarity, upward translation

DOI:10.13760/b.cnki.sam.201902006

翻译问题与意义问题是一体的，这在维尔比夫人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其表意学理论包含了丰富的翻译哲学思想。翻译问题是表意学着力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维尔比夫人在界定表意学之学科性质时即指出，“表意学是解释哲学、翻译哲学”（Welby, 1983, p. 89, p. 161）。维尔比夫人的意义理论别具一格，得益于其对翻译问题独特、深刻的理解。因此，对维尔比夫人翻译理论进行系统探讨，不仅是要切实把握表意学理论体系，也是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翻译哲学理论。

一、思想翻译：表意学的方法论

维尔比夫人往往自造新术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signifiacs”一词即是如

此。但对于“翻译”这一关键概念，维尔比夫人却沿用了通行的“translation”，同时谨慎地予以说明：“必须记住，虽然我们已经选择了‘translation’这一术语，因为它至少部分的含义在此已被使用，但它未能覆盖全部的范围。许多带有前缀‘trans-’的词语只代表被谈论之过程的一个方面，比如：迁移、转化、嬗变、变形，尤其是价值评估。”（Welby, 1983, p. 126）也就是说，维尔比夫人在其表意学理论中虽然保留了“translation”这一术语，但她有意将其内涵扩大，直至包含全部带有“trans-”这一前缀的词语之所涉。她表示，“在我所说的一切中，我们必须记住，我思想的泉源展现的就是活动力，以最精到之辞来说，就是翻译、转化和变形。这前缀蕴含着重要的意义”（Petrilli, 2009, p. 721）。的确，对维尔比夫人来说，翻译不是特殊的语言活动，她通过对前缀“trans-”的强调凸显出一种“转化”能力——一种与生俱来的、在大脑中依据相似性或通过创造相似性而自主进行的认知活动。以“trans-”为前缀的词语似乎最能代表人类所具有的这种了不起的特点（Welby, 2009b, p. 685），换言之，这种转化（尤指意义转化）能力是人类的优势之所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维尔比夫人并不认为这一意义扩展式的翻译过程是一种复杂的、特殊的情况，与之相反，它完全是自然和普通的事物”（Eschbach, 1983, p. xxiv），它是人之为人最自然、最基本的表现，正如维尔比夫人所强调的，“当我们学会去阅读和翻译所有从任何意义上与我们相关切的事物时，我们将成为的并非是超人，而是正常的人类”（Welby, 2009d, p. 719）。她表示，“人类最为自然且自发的倾向，是去寻找、探索、掌握未知的倾向”（Welby, 1983, p. 210），而这种倾向实质上就是翻译。

在为1902年《哲学和心理学词典》撰写词条“translation”时，维尔比夫人就已指出，翻译“（1）按照字面意义来讲，是将一种语言转变为另一种语言；（2）依据另一学科来表达某门学科；一个特定的论点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领域；使用一组事实描述另一组事实，比如，一篇物理的或生理学的论文可能被实验性地‘译’为美学的或伦理学的论文，生物学的表述被‘译’为经济学的事实陈述”（Baldwin, 1911, p. 712）。这种不将翻译局限于字义转化的观点，在维尔比夫人的理论中一以贯之，而且，翻译被渐渐深化、明确为一种思想活动：它涵括不同思想、经验之间据相似性或创造相似性而进行的转化；这种转化在大脑中自主展开，再自然不过地进行着，且不可取消；当然，这种转化过程也是针对翻译对象进行的语言处理，思想翻译与语言翻译难以切分。

表意学中“翻译”一词的内涵远超出常规意义，即并非仅指涉过往狭义的文本间（语内或语际）的词义转化；其转化能力涉及人类思维、行动的方方面面，可以说“生命直接依赖于它”（Welby, 1983, p. 194）。人们要将饥饿感转化为寻找食物的动力，要将疼痛感转化为识别危险的意识，此外，用熟悉的事物来类比以理解相对陌生的事物，同样是翻译转化——人类的生存以及智性活动与翻译息息相关。但是，表意学所重点强调的思想翻译不仅是在大脑中进行的、不可取消的认知活动，还更为具体地指涉发生于不同思想之间的转化、吸收。维尔比夫人以论辩为例指出：即便在互相攻击对方论点的争论中，争辩双方无论哪一方占据优势，其结果也不过是一种观点被另一种观点取代，每个论者的目标都应当是把对手的立场翻译给自己（p. 151）。可见维尔比夫人对不同思想体系、理论话语之间的“翻译”可以促进不同学科、知识以及人际的交流有着清晰的认知，因此“她将（翻译的方法）理论化为在知识和经验的进步中的决定性因素”（Petrilli, 2009, p. 382）。维尔比夫人指出，“翻译是表意学的典型形式”（Welby, 1983, p. 51）。事实上这种具有转化性质的思想翻译与意义问题关联密切，与其说它是形式，不如说它是表意学中的方法论。

在表意学中，翻译是探寻意义、获取知识的方法。维尔比夫人明确指出，这种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比以往这个词语所应用的范围更广。对这一思想的含义的考察，使得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把人定义为（对）世界的表达”（Welby, 1983, p. 245）。正如苏珊·佩特里利所言，“维尔比把翻译当作解释和理解的方式，并将之与符号和意义理论联系起来”（Petrilli, 2009, p. 274）。翻译在维尔比夫人看来是一种探寻的方法，她不断地强调其重要性（Petrilli, 2009, p. 297），称这种探寻方法“既检验知识也扩展知识范围”（Welby, 1983, p. 129）。佩特里利在对比阐明维尔比夫人同奥格登（C. K. Ogden）学术观点之联系时总结道：“（对他们两人来说）翻译不仅仅被理解为常规意义上的跨语言交流、‘语内’翻译，也不只是作为替代或重复。因为维尔比和奥格登都设想‘翻译’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同‘解释’趋同，因而与探索的过程、意义的更新、知识的获取趋同。”（Petrilli, 2009, p. 745）的确，这种通过翻译进行的不同观点、思想之间的转化吸收，若能在更为自觉的层面上得到运用，将有利于取得新的知识突破。维尔比夫人就曾做出尝试，以神经科学的最新发展为蓝本来解释宗教神学，通过引导双方进行互释、转化，赋予彼此新的视角和启发，从而更好地阐明各自的观点，促进学科的发展。

维尔比夫人有意识地将这种翻译转化的思维方式上升为处理意义问题的方法论，在不断的使用中予以强化、恢复：既在意义训练中恢复本应与生俱来的思维方式，又依靠对这种思维方式的启用，使意义问题脱离所陷的泥沼。因此，将翻译作为表意学之方法论，是维尔比夫人基于对意义问题的理解而有意为之的，表意学的翻译理论研究，既是揭示翻译之本质的过程，也是探索恢复正常的翻译能力的过程。“意义三分”（meaning triad）将意义（meaning）划分为感知（sense）、意图（meaning）^①、意味（significance）三个层级，不仅区分了构成意义的三个主要方面，也明确了形成意义的指涉活动的三个阶段。这一关键概念的提出使维尔比夫人为表意学之翻译这种思想活动和意义生产过程提供了可依循的途径，从而彻底确立了翻译作为表意学之方法论的地位。

维尔比夫人在致赫兰德（H. S. Holland）的信中写道：“我们在思想领域掌握了翻译的准则，如同我们在言语中所做到的那样，这时我们会发现真理的范围永远在扩展，力量在增长。”（Cust, 1929, p. 61）翻译问题与意义的解释以及生成密切关联，这正是维尔比夫人视表意学为翻译哲学之缘由；唯有重启表意学意义上的翻译功能，才能为眼下陷入僵局的意义问题寻找到出路，为知识、经验的更新拓宽道路，为人际、国际间的沟通提供保障。作为表意学之方法论的翻译是思想翻译，而不仅仅是具体的语言文字翻译，这与表意学不囿于语言符号之意义研究，而力图关涉所有表达形式之意义研究的学科预设相契合。

二、可译性新思：“结构相似”与感知

维尔比夫人对翻译作为一种思想转化活动是否可行可信的忖度，实质上就是从思想翻译的视角对可译性问题展开的思考。由于她赋予“翻译”这个术语以最为丰富的内涵，她对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思考超出了狭义的文本翻译这一范畴，转向思想认知、人际交流等维度。在认知活动中，维尔比夫人无疑认可意义的可译性，而她对“结构相似”（homology）的思考为其观点提供了支撑。在维尔比夫人看来，翻译是“在多样或差异中发现和运用共同元素”（Welby, 1983, p. 148），差异之中具有共同元素或相似性，是翻译活动展开的前提；翻译的可译性问题，在这一阶段，与可比性问题等同。她

^① “Meaning”一词，作为整体之意义时译为“意义”，作为意义三分中的第二层级时则译为“意图”，以便于区分和表述。

指出, 类比是“我们进行大部分心智活动的唯一的方法”(p. 24), “必须被再一次重复强调的是, 不管我们愿意与否, 我们的思想是从类比开始的。剥去一切, 你无法言说, 除非假定你的心智和你要与之交谈者的心智是类同的”(p. 156)。在肯定了类比对于认知活动的价值之后, “借鉴生物学对于表面上或外观上的相似(analogy)与结构上的相似(homology)的区分, 维尔比确立了一种在表意过程和知识获取中更‘强大’以及更有效的‘analogy’(homology)类型”(Petrilli, 2015, p. 93)。维尔比夫人在致克利福德(Clifford)夫人的信函中指出: “真正的类比能力是比较和结合真正可以被比较与结合的; 是使‘已知者’来教会我们‘未知者’的能力”(Petrilli, 2009, p. 141), “因为类比的價值存在于它假定或宣称的与经验模式相联系的能力显然是发散的, 甚至是不统一的, 但必然是互不相关和完全不同的, 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它们联系起来, 以提升我们对两种看似不相容或不相关的思想或作用的富有创造性的掌握”(Welby, 1983, p. 156)。上文所述的“真正的类比能力”所意指的正是发现结构相似的能力, 这是在具有相当差异的事物之间予以识别或创造相似的能力。

对可比之类的扩展, 自然是对可译之处的扩展。维尔比夫人指出, 我们首先要学会翻译, “发现意想不到的和非想望的对应和等同”(Petrilli, 2009, p. 494), 这个发现的过程就是寻找或创造结构相似的过程。此时我们联想到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观点, 他认为, “文化亲缘性”的存在是两种文化经长期交流形成的, 是交流使得“译文”与“原文”建立起“不完全相同的等值”(2006, p. 34)。也就是说, “能否在译文和原文间实现‘不完全相同等值’的关键并不在于目的语和出发语之间是否具有文化亲缘性, 而在于译者是否愿意采取实际行动促使其实现。这种实际行动, 利科称为译‘不可译’”(张晓明, 2009, p. 124)。显然, 在表意学中寻找“结构相似”的努力就是译“不可译”, 而文化亲缘性的形成就是在不同文化或不同事物间寻找或创造结构相似的过程。结构相似是表意学中确保译“不可译”得以成功的核心概念, 尤其对不同思想之间的转化而言, 它打通思想间的壁垒, 在翻译转化中创造、实现双方的对等, 使意义可译, 并力图从中获得更多新的意义。基于“结构相似”的翻译, 能够在更确切、更全面的同时不失创新性地实现意义之间的转化, 成为知识与经验取得进步的关键因素。

结构相似使得人类的翻译总是有效的、正当的, 这种使得翻译成为可能的共同元素就是“experience”, 翻译从各式各样的“experience”中寻找结构相似。“翻译是将行为和事实从一个‘领域’向另一‘领域’的转移, 因此

(从这一点看来), experience 意味着无限的可转移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至少在给定的点上)每一经验模式都可在另一模式中进行复制”(Welby, 2009c, p. 509);“人类真正与生俱来的是有效地解释和翻译 experience 的每一可能形式的能力”(Welby, 2009c, p. 510)。我们认为在表意学中“experience”一词既有动词“体验”之义,也涵括名词“经验”之义,或者说,“体验”(动词)最终会累积成“经验”(名词)。人类所体验的对象是世间的万事万物,将这种体验简化理解,就是表意学中常言的“感知”。然而,维尔比夫人敏锐地觉察到,人类对事物之意义的感知已然出现问题,比起从事物自身出发来探析意义,我们更多的是通过感知事物上贴的意义标签来理解它,这就在翻译中造成了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哲学理论中提出的“存在之被遗忘”(参见蔡新乐,2016, p. 154)。对翻译对象的体验与翻译对象是一体的(体验本身就是对对象的直接把握、描述,有时以感觉的状态存在)。若体验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感觉,是一种人类理性参与较少的自主的翻译过程,那对它的忽略也就意味着对翻译对象之存在的部分消解。对这种情况无所觉察的人类若是仅依据理性的知识结构中对翻译对象的描述、印象来进行翻译、转化活动,不仅会出现机械的意义翻译,也会遗忘或无视存在。此外,语言具有过滤作用,假若不注重体会鲜活的现实、经验,而一味依靠语词进行意义转化,最终必将造成翻译准确性的欠缺。维尔比夫人的翻译理论虽以意义问题为核心研究对象,但对“存在之被遗忘”问题有所警惕并预防。她在研究之初就突出了对事物本身的感知,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翻译哲学回到事物本身,“让事物站立起来”(蔡新乐,2016, p. 277)的原则相近。人类是符号动物,具有极好的符号运用能力,却也使得自己的智性活动完全地依附于符号;表意学对翻译中“存在之被遗忘”的重视,警醒了满足于在已有符号体系中生存、思考的人类,促使人类转而探索如何才能恢复对存在的感知。维尔比夫人指出,“一切事物都培育了固执于陈规旧套的倾向;新的发展则包含一种独特的甚至痛苦的努力”(Welby, 2009a, p. 213),超出习俗惯例并非易事,需要付出辛劳,而这辛劳最初与感知相关。感知既是表意学意义三分理论的第一层级,是意义活动的第一阶段,也因其基础性而在事实上存在于意图、意味这两个层级或阶段中。对相似经验、相似环境的感知为翻译的进行积累了材料,即“共同意义”(common meaning)^①;对具体语境(广义)的感知是否到位,将左右翻译的成败,如此,表意学突出了语境

① 维尔比夫人承认语言符号具有基础性的共同意义,这使得她的意义理论免于滑向主观主义。

(广义)在翻译中的重要性。没有感知的翻译是无法觉察现实之动态发展的,这种翻译势必因其僵化自封而丧失准确性与创新性。

感知方面的欠缺将直接影响翻译活动的开展,至此,感知作为表意学之核心概念意义三分的第一层级,在翻译中的重要性得到凸显。意义总是可译的,但翻译并不是依赖于字典、词库进行的字面意义的机械转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人类的体验/经验随之改变,感知发挥探查与接收作用,翻译的动态性特征最终决定了意义的动态性,意义在持续不断地翻译转化中丰富其自身;因此,对感知的强调,是动态意义观的应有之义。如果不注重释义活动中的感知环节,在意义活动中的每一阶段不对对象、存在进行充分的把握,不对语境保持充分的敏感从而做出正确的反应,就难以进行有效的翻译。

感知作为表意学的理论体系内意义三分的第一层级,是“母性感知”(mother-sense)这一概念的简缩,后者有更深刻的理论内涵。“与自然和事实相联系的发展中的天赋,我们称之为‘心智’(mind),它在忽略虚幻以及觉察实际特征的意义上是一种通过表象看到现实的力量,(这种天赋)好像已在某一阶段丧失了。”(Welby, 2009a, p. 212)此处,维尔比夫人所说的“心智”实质上就是“母性感知”,她认为母性感知能够“为我们处理并提供即时察觉、意识和解释的材料。它是动物本能在进化之中的后继物,或者说,它在价值上构成了更进一步的阶段”(Petrilli, 2009, p. 704)。具体地讲,母性感知“是一种迅敏、无误且富洞察性的辨别与解释的力量”(p. 677),大致包含预兆、直觉和预判、茅塞顿开、对价值的迅速把握、对现实的深刻认识(p. 704);母性感知作为“我们对现实刺激做出的所有健康的反应”(p. 691),其对“现实”的注重与把握,在表意学理论中,就是对翻译对象以及具体语境的强调。从表面上来看,母性感知与父性理性(father-reason)貌似是对立的,上文中对体验与由经验沉淀而来的理性之关系的分析是二者对立一面的注解;事实上,父性理性是由母性感知发展而来的,只不过随着父性理性的发展与壮大,即随着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的提升,母性感知被边缘化,甚至被压制,使得我们对现实、存在的关注也相应地降低。在具体的翻译活动中,就表现为随着相对固定的意义系统的不断充实,人们满足于对所谓“显明意义”的使用,满足于以概念谈概念,而真正的翻译对象以及语境反倒常常被忽视。在意义活动中,父性理性对应同一性逻辑,意图巩固自身的主导地位,而母性感知由他者逻辑主导,面向多元开放,因此,对应的翻译一个导向僵化,一个具有动态性。有鉴于此,表意学力图以自己

的意义研究恢复母性感知与父性理性之间原本的联系。在父性理性占绝对优势的状况下，这种恢复联系的工作实质上表现为对母性感知的培养与复兴。

表意学呼吁“恢复我们未能发展的和几乎已经失去的原始的翻译能力”（Petrilli, 2009, p. 679），而培养母性感知能力是人类的思想翻译恢复其健全性的唯一途径。母性感知虽是与生俱来，但它仍需要我们通过后天的培养来强化。表意学恢复与强化母性感知的努力，不是返祖、退化，而是恢复人类原本健全的翻译能力，锻炼翻译性思维的第一步。对母性感知的恢复与培养不仅是维护意义动态性的前提，也是使“翻译”能力健全的保障：唯有健全的翻译，才能为不同学科、不同知识体系、不同思想的沟通护航，才能实现思想、知识、经验的翻新与创造。维尔比夫人指出：“其实动物也具有理解变化之现象的能力，人类如果能在翻译的形式中（如同在其他事例中）重新获得这种能力，将能‘解决’许多眼下‘无法解决’的事情”（Petrilli, 2009, p. 48），因为发现、创造结构相似的能力能够帮助人们打破业已形成的僵化的思想体系，从而寻求新的可能性。可译性的基础在于体验/经验的共通，与体验/经验相关联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感知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自主的翻译转化能力，是一种对存在的充分感知与判断，是使翻译直面事物本身的保障。

因此，对思想翻译中结构相似之重要性的强调，呼应了贯穿于表意学的批评质询思想。维尔比夫人通过对“感知”（sense）一词的解释说明翻译是可能的：“感知”一词内含着从感觉/知觉到概念的完美翻译（Welby, 1983, p. 151）。我们尝试推测维尔比夫人的考量：“感知”这一术语，就其义项而言，有感觉/感知、意义/意识、观念/理性，等等，概括了从感性上升为理性的过程，其中所内含的转化是通过发现、创造结构相似而展开的。发现结构相似的能力是母性感知天然具有的。母性感知说到底是一种将事物联合起来而非加以切分的思维方式，在不同的符号和价值体系中，它以创建新的关联带来新的启发。批判并非是为了质疑他者、否认他者，而是为了在翻译转化的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发现、创造存在于彼此之间的结构相似，以实现双方的发展。

三、“向上的翻译”：对话、意味与伦理

维尔比夫人认为，“致使翻译失败之缘由，部分是道德的，部分是智力的”（Petrilli, 2009, p. 477），换言之，人类在伦理/道德与知识/智力方面未能做到“向上”，是思想翻译失败的原因。何为“向上的翻译”（upward

translation)? 维尔比夫人在致席勒 (F. C. S. Schiller) 的信中提道: “通过一种向上的翻译我想表达什么呢? 你有没有发现普通的翻译都是横向的, 大体上说来, 也就是在同类级别由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位置——从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 但是我想要一种竖向的翻译——一种从‘低级的’到‘高级的’转化; 而这正是达尔文给予我们的。我们是一只蝌蚪甚至一条蠕虫的最高级的翻译。” (Petrilli, 2009, p. 625) 维尔比夫人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启发, 经过自己的观察与思索, 认为与生物体可经历进化发展一般, 人类的思想道德、知识经验等在整体上也经历着不断向上的翻译转化, 比方说: 在思想、科技领域, “炼金术的梦想已经转化成化学上的成就, 它的祈祷在一种意想不到的意义上得到了回应; 它已经从基本金属转变成黄金; 占星术的梦想已经由天文学变成现实” (Welby, 1983, pp. 146-147); 在精神、道德方面, 翻译在“赌博”中提取出“冒险和敢于争论”的积极成分 (pp. 127-128)。简言之, 向上的翻译是顺从事物向上发展趋势的翻译转化, 既涉及知识的扩容、更新, 又涵括道德的提升、进步; “向上”既是对翻译之整体态势的概括 (特别是思想、知识等领域), 也是翻译所追求的目标 (尤指精神、道德领域)。方位名词“上”在此是隐喻用法, 知识领域“向上”简单理解起来就是取得发展进步, 表示知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这种向上的翻译的形式具有对话性, 从而带有伦理色彩; “对话”这一术语虽不曾直接出现在表意学的论述之中, 然而表意学思想处处显示出对话性: 涵括维多利亚时代各领域近 460 名杰出学者的维尔比交际网的存在, 是其学术活动之对话性的明证; 她对批评质询思维方式的推崇, 对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的倡导, 反映出其思想中的对话意识; 而意义可塑性更是从意义理论上明确了符号之意义对语境的适应, 准确说来, 意义是符号同语境经由对话而确立的。事实上, 以对话作为翻译活动展开的主要形式, 该主张背后隐含着维尔比夫人的伦理决断。道德领域的“上”, 是超乎私欲的伦理责任感, 是具有他者意识的、着眼全局的价值判断, 需以正确的伦理价值观为导向。明确内含于向上的翻译中对伦理价值的追求, 是我们真正把握表意学之翻译思想的最佳途径。

保罗·利科曾说忠实与背叛是译者难以摆脱的两难选择 (Ricoeur, 2006, p. 4)。维尔比夫人则试图以自己的意义理论研究指出翻译的第三条道路: 对话。同忠实/背叛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伦理意味一样, 对话显然也是一种伦理上的选择, 其有效进行要求翻译者具有明确的他者意识, 善于倾听, 反对独白, 尊重存在于事物之间的多样性、差异性, 以平等友善的姿态进行翻译, 以协商的方式妥善处理可能出现的差异。对话意味着平等、友好、开放

的互动状态，这是保证人际沟通以至文化、政治沟通顺利进行的前提，是在最大程度上揭示意义的方法，它同作为利科翻译伦理思想之核心的“语言好客性”（linguistic hospitality）具有极大相似性。

翻译即“翻异”，要在存有差异的事物间实现转化。就从事翻译活动的个体而言，差异存在于自我与他者（有时是自我与自身、文化与文化）之间，如何处理存在的差异，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伦理问题。尊重差异（年龄、种族、性别、社会地位、生活经验、观念等）是一种价值信念，这在表意学中有着清楚的体现。维尔比夫人清楚地认识到，翻译作为认知方法使不同的思想、声音进行对话交流，唯有保持多样性，在诸多“异”中寻求到结构相似，才能增进认知，使得表意学之翻译具有向多元化开放的可能，以恰当地处理、解决问题。她反对创建或择定某种统一语言以实现交流的顺畅，而是呼吁通过平等对话交流来澄清模糊性（ambiguity），求同存异，最终化解矛盾，消除隔阂，实现共存。相应的，她必然也反对思想上的霸权。差异的存在不是使彼此分割以至对立的理由，事实上，正因彼此之间存有不同，所以才有互动的呼吁、诉求。从维尔比夫人对待差异的态度中可看出她具有明确的他者意识。维尔比夫人坚定地认为，自我与他者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紧密相连的。没有他者的存在，我们无法认识自己，我们需要在与他者的关系中确立自身。在表意学中，他者不再是意义活动中被动的、消极的存在，而是重要的、积极的参与者。他者意识贯穿表意学以意义三分为根本的意义活动全过程：意义的第一层级所强调的感知，要感知的是对象，即他者；意义的第二层级要探寻的是他者的意图；意义的第三层级出于引导他者的目的，注重对相应价值的擢升。对话的效果取决于朝向他者开放的或高或低的程度，只有关注他者，才能确保平等有效交流的展开，才能用翻译调节参与翻译活动双方的关系。他者意识的存在使得表意学之意义理论注重感知，注重倾听，吁求以对话取代独白。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对话式翻译之中暗含着维尔比夫人反对将事物截然对立的观念，翻译的进行在实质上是发现和创造新的联系的过程。但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此，她还以翻译转化为手段，寻求意义在价值上的增值。施密茨（Walter H. Schmitz）认为，维尔比夫人所说的“向上的翻译”试图进行“人类的一种新的道德建构”（Schmitz, 1985, p. xc），在这一建构过程中，“我们试图彻底消灭儿童或野蛮人的邪恶倾向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针对的是始终把这些（邪恶）转化（translation）成相应的善”（Welby, 1983, p. 144）。若将道德上的选择简化为善与恶，维尔比夫人显

然认为善恶之间存在转化的空间，而引导恶转向善，也是思想翻译的要务之所在。要言之，为求使人类在道德领域保有向上之势，与其寄希望于从源头消除人性之不足，维尔比夫人更倾向于将不足之处逐步转化（translation）至更高的形式。当然，意义在价值上的增值并非仅仅关涉道德层面的善恶转化，我们还应关注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如何通过向上的翻译实现价值的擢升——这是作为“意味哲学”的表意学之要务。

基于对话式翻译活动对伦理道德维度的强调，在表意学核心概念意义三分中已有清楚的体现：由感知到意图，再到意味的意义层级所呈现的，就是意义向上的进化过程。意味作为意义三分的第三层级，即意指活动的最后阶段，更是直接指向了价值维度，特别是伦理价值，它“包含着感知与意义，但在范围上超越了它们，并涵括了某些事件或经验的影响深远之结果、暗示、最终结果或效果”（Hardwick, 1977, p. 169），“意味总是多重的，它通过呈现其吃紧处、其吸引我们之处、我们感受到的那一瞬间，通过表达其情感力量、想象价值、道德性状，展示其普遍的或至少社会的范围，不仅强化了意义，也强化了感知”（Welby, 1983, pp. 5-6）。因此，意义三分本身就是引导人们在翻译活动中注重伦理/价值向上的路径，这一概念是表意学得以成为伦理色彩浓厚的“意味哲学”的保障。向上的翻译，最关键的一步在意味层级，意味作为意指活动的最后一个阶段，负有升华意义之重任。意味与价值理论的关联最为紧密，然而，价值往往不是直观可见的，它需要人们通过推理，以预见性眼光进行把握，换言之，要通过翻译活动才能将隐于事物或者说是隐于符号之中的潜在的意义凸显出来。而这预见、推导的过程，正是人类责任感、正义感、价值观运作于其间的过程，这使得意味层级还涉及对价值的选择、对善恶的扬弃。佩特里利指出，“作为对‘意味’的研究，表意学请求我们对语言和生命采取一种负责的/回应的和对话的态度，向他者开放并摒除独断论”（Petrilli, 2015, p. 165）。可以说，以意义三分为核心的表意学释义途径，十分关注在意义活动中人类的责任行为能力，重视强化人类选择善的意识，以促进伦理/价值的彰显。

维尔比夫人之所以提出要寻求向上的翻译，与她对思想与语言之间密切关系的预判相关：人类作为能够通过符号对自身进行认知、反思的主体，应当做到可以预见自己的言语、行为的影响及后果，从而有意识地趋利避害。人类通过符号进行思考，具有“以言行事”的能力，符号之间的伦理，最终成为人类的伦理；思考符号所用的思维方式，最终就是人类思考事物的思维方式；因语言与思维的不可分割性，对语言之伦理维度的关注，应着眼于更

高的层级，即如何使语言这一工具更好地为人所用。每一种翻译的选择都意味着一种道德上的决断，人类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在道德上进行选择的过程，言能行事，会对他者造成影响，翻译便应承担起道德上的责任，引导人类道德伦理发展在总体上呈现向上之势。因此，人类作为符号动物，在经由符号进行思想翻译活动时，应对此抱有责任意识；事物处于上升状态，语言应同它一样向上，而语言的向上就是思想的向上。因为语言为人类所独有，既受现实影响又反作用于现实，所以向上的翻译不仅仅是时代、科技发展之必需，也是对人类伦理/价值维度的引导、擢升。在表意学理论中，最具道德意味的术语应当是“语言良知”，这是一种使用语言的审慎态度，亦即谨慎地进行语言意义的翻译转化。这种审慎的态度作用于人类社会，必然会减少存在于人际以至国际的误会、摩擦，并降低学术交流、思想交流中的误解，从而确保它们正常、有效地互动。向上的翻译能塑成语言良知，而语言良知保障向上的翻译的进行。事实上，表意学的动态意义观赋予意义以极大的自由度，这便需要在伦理/价值维度予以最严格的约束，并以实效检验交流成果。就翻译、交流而言，最基本的义务就是倾听，而非主观臆断；最基本的道德是尊重差异与分歧，而非强行统一；最基本的责任是价值擢升，而非使之滑坡。表意学对向上的翻译的追求，充分彰显了其对于伦理问题的重视，这影响到现代伦理符号学的建构。

结 语

总的说来，维尔比夫人理论中的翻译是一种在大脑中自主进行的转化，是自动进行且无法取消的认知活动，是思想翻译。在表意学理论体系中，翻译作为方法论而存在，意义混乱问题出现的根源之一就在于这种自主翻译功能的停滞或退化，对翻译功能的恢复是解决意义混乱问题的本要。可译性的基础在于人类经验的共通，而母性感知作为人类潜在具有的共同而本能的感知力，是获取此种经验的前提，也是对自主翻译功能最早、最基本的运用。强调对事物本身进行感知，扭转了翻译中“存在之被遗忘”的窘境，打破了僵化的翻译模式，凸显了意义的动态性。在这一前提下，翻译总是有效的。表意学追求向上的翻译，以对话性的翻译为形式，以获取意味为目标，突出了对意义活动中人类的责任行为能力的重视与培养，具有明确的伦理意味，这对实现有效沟通、化解无谓矛盾、消弭战争意义重大。通过对维尔比夫人的翻译哲学思想的阐释，可以看出其思索虽称不上系统，却直击问题要害且不失新颖，值得我们继续探索和深化。在逻辑理性思想盛行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表意学注重意义之动态性, 强调对体验/经验之感知, 关切意义之实效的翻译思想无疑是具有革新性的。

引用文献:

- 蔡新乐 (2016). 翻译哲学导论.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张晓明 (2009). “语言好客性”与“译‘不可译’”——保罗·利科翻译思想述评. 外语学刊, 5, 121—125.
- Baldwin, J. M. (Ed.) (1911).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Vol. 2. New York, NY: The Macmillan Company.
- Cust, H. (Ed.) (1929). *Echoes of Larger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Early Correspondence of Victoria Lady Welby*. London, UK: Jonathan Cape.
- Eschbach, A. (1983). Significs as a Fundamental Science. In Victoria Lady Welby. *What is Meaning?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gnificance*, ix—xiii.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Hardwick, C. S. (Ed.) (1977). *Semiotic and Signific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Charles S. Peirce and Victoria Welby*. Bloomington, IN and London, UK: Indiana University.
- Petrilli, S. (2009). *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Signific Movement*. Berlin, DE: De Gruyter Mouton.
- Petrilli, S. (2015). *Victoria Welby and the Science of Signs*. New Brunswick, CA and London, 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Ricoeur, P. (2006). *On Translation*. London, UK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chmitz, H. W. (1985). Victoria Lady Welby's Significs: The Origin of the Signific Movement. In Victoria Lady Welby. *Significs and Language: The Articulate Form of Our Expressive and Interpretative Resources*, ix—ccxxxv. Amsterdam, NL: John Benjamins.
- Welby, V. (2009a). An Apparent Paradox in Mental Evolution. In Susan Petrilli (Ed.), *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Signific Movement*, 210—224. Berlin, DE: De Gruyter Mouton.
- Welby, V. (2009b). Primal Sense and Eugenics. In Susan Petrilli (Ed.), *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Signific Movement*, 683—685. Berlin, DE: De Gruyter Mouton.
- Welby, V. (2009c). The Human Ascent. In Susan Petrilli (Ed.), *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Signific Movement*, 509—511. Berlin, DE: De Gruyter Mouton.
- Welby, V. (2009d). The Recovery of Primal Sense. In Susan Petrilli (Ed.), *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Signific Movement*,

718—719. Berlin, DE: De Gruyter Mouton.

Welby, V. (1983). *What is Meaning?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gnificance*. Reprinted of original edition, London, 1903. Amsterdam, NL and Philadelphia, P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作者简介:

孙凤,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领域为符号学。

屠友祥,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符号学、语言哲学。

Author:

Sun Feng, Ph. D. candidate in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at Shandong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ield is semiotics.

E-mail: sunfeng0613@163.com

Tu Youxiang,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Sun Yat-Sen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fields are semiology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E-mail: tuyouxiang@126.com